



蒙汉交汇区村落的民族 民俗文化融合历程考察 ——以鄂尔多斯村落为例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3-0078-09

●段友文 高瑞芬

[摘要]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是包含着两种文化特质的文化区域。本文选取鄂尔多斯这一蒙汉交汇区作为研究背景,以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鄂托克旗的村落为例,从民俗学的视角审视蒙汉两个民族在这一特定区域中文化互动的一般进程。从纵向发展看,两族民俗文化在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时期,两族民俗的流向和互渗程度有着很大差别;从横向扩布看,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在空间上具有不平衡特点,农耕文化的延伸渗透和蒙汉两族的杂居深刻地影响着民俗融合的程度。蒙汉两族民俗文化融合带来了比原来单一文化圈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民俗生活成为洞悉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以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来研究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长期碰撞、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和谐相处,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交汇区村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游牧与农耕 交汇区 民俗融合 涵化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吸取、互相注入,使中国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蒙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居、交往以及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交互影响,最终催生出鄂尔多斯独具特色的区域民俗,这种民俗兼具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双重特征,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融合之后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本文以蒙汉交汇区村落的民俗为研究对象,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达拉特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走西口’移民运动与蒙汉民族民俗融合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 09YJA850013)的阶段性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年第3期(总第70期)

2011.No.3(Total No.70)



旗、鄂托克旗的村落为例,分析、探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杂居共处,由此带来的这一特殊文化区域的社会变迁,研究这一特殊文化区域形成发展的过程,探讨其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这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对于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与民族构成

鄂尔多斯的社会变迁是以这里独特的生态环境为依托的,广阔的草原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域近千年的游牧传统。清代以后的移民浪潮又将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农耕文化带入了鄂尔多斯,形成鄂尔多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格局。

准格尔旗:“准格尔”为蒙古语中的词,东部之意。准格尔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旗境的北部和东部被黄河环抱,东部和南部分别与山西偏关、河曲和陕西府谷相邻。北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土地平坦,沿河地区因与黄河相邻,地下水蕴藏丰厚,为著名的产粮区。1990年,全旗总人口为23.68万人,其中蒙古族1.87万人,汉族21.76万人。^①蒙古族分布于全旗,与汉族杂居于各乡村。准格尔旗在清康熙前为纯牧业旗,1697年“黑界地”开放后,大批晋陕汉民深入旗内腹地,与蒙民杂居相处。

达拉特旗:位于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是蒙古语部落名。1996年,全旗人口为31.58万人,其中汉族30.3万人,蒙古族1.12万人。^②黄河流经该旗北部边缘。清咸丰年间,晋陕两省的走西口移民进入达拉特旗后经马场壕、新民堡、王爱召、大树湾而至包头。这里也是鄂尔多斯汉化较为普遍的旗,旗内除了展旦召苏木与吉格斯太、蓿亥图、马场壕三乡还集中居住着一批蒙古族人外,其他各乡镇内的蒙古族均零星散住于汉族中间,并被汉族同化。本项调查选取了展旦召苏木展旦召嘎查(村)、蓿亥图乡牧业大队、解放滩乡马技民村三个村落作为调查点,其中展旦召嘎查、牧业大队为汉族村落包围下的蒙古族村落,解放滩乡马技民村则为典型的汉族村落。

鄂托克旗:该旗是鄂尔多斯草原面积最大的牧业旗,总面积21487平方公里。1993年,全旗总人口99950人,其中蒙古族22845人。“鄂托克”意为“部”或“营”,是元、明两朝蒙古“万户”下设行政建制名称。畜牧业是这里的主体经济,该旗也一直以“水草丰美,土产宜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而闻名。自清末放垦以来,鄂托克旗边沿牧地逐渐变成农区,牧民向该旗腹地的牧区集中。全旗85%的蒙古族人口聚居在阿尔巴斯、查布、包乐浩晓、额尔和图、苏米图、察汗淖尔、新召七个苏木,另有13%的蒙古族人口集中在乌兰镇。^③

二、蒙汉民族民俗文化融合的三个阶段

(一)前期:“放垦”与蒙汉民俗文化融合的起步

汉族移民进入鄂尔多斯早已有之,然而真正的移民浪潮始于清政府放垦政策的实行,它成为蒙汉民俗融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随之而来的就是鄂尔多斯蒙汉民俗的广泛融合。

1. 清末的放垦政策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连续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经济上内外交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子监司业黄恩永上奏称:内蒙古乌伊两盟,牧地纵横数千里,河套土质更为肥沃,不如国家经营垦殖,以利国库的财政收入。^④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了《辛丑条约》,国库再次告急。为了筹集银款,慈禧太后接受开垦蒙地的建议,以贻谷为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主持垦务。光绪二

① 准格尔旗志编纂委员会.准格尔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达拉特旗史志征编办公室编.达拉特旗志[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③ 鄂托克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鄂托克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④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克昭盟志[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321.

段友文 高瑞芬·蒙汉交汇区村落的民族民俗文化融合历程考察 ——以鄂尔多斯村落为例

十八年, 始谷正式接手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垦务事宜, 伊克昭盟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伊克昭盟共报垦 45 356.9 顷土地, 放垦 35 532.2 顷土地。^①

表 1 清末伊克昭盟垦务情况一览表

旗名	报垦地	报垦时间(年)	报垦数目(顷)	已放土地(顷)	所得押荒银(两)
准格尔旗	黑界地	1905~1906	1588.25	1588.25	60,339.5
扎萨克旗	黑牌子地	1905	1608	1608	20,406.9
	祝嘏地	1904	575.35	575.35	6015.9
乌审旗	旧牌子地	1909	1452.5	1452.5	18820
	祝嘏地	1904	530.7	530.7	5540.8
鄂托克旗	月牙湖地等	1903	10,000	175.3	4363.8
杭锦旗	东中两巴噶等地	1904	4100	4100	305,271
郡王旗	灶火等地	1903	9638.9	9638.9	108,219.9
达拉特旗	四成地	1903	1225.2	1225.2	100,447

资料来源:《伊克昭盟志》。

2. 汉民早期的“跑青牛犊”生活

自清政府放垦蒙地以来, 山西和陕北的破产农民陆续流入鄂尔多斯。当时的晋陕汉民称鄂尔多斯为“草地”、“后草地”, 也叫“蒙地”, 由晋陕到鄂尔多斯叫“上草地”、“走口外”, 回晋陕老家叫“回口里”。起初政府禁止移民到口外定居, 更不允许他们与这里的蒙古族通婚, 汉民只能以“雁行客”的身份“跑青牛犊”。春天, 他们赶上牲口来到口外, 拉上“二饼子车”和犁、耩等农具, 到租定的地方, 就地挖坑, 上面拍土, 架上椽子, 搭上柴草, 抹上草泥, 搭建起临时寄身的窝棚(俗称“茅庵房”), 就算“安家落户”。他们在口外辛苦耕种半年, 到秋天就把交租后剩下的粮食拉回口里。他们年年往返, 循环不断, 这便是“跑青牛犊”。

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刘家壕村的村民 WSF 向我们回忆祖辈初到鄂尔多斯“跑青牛犊”的情形:

我们祖上是陕西府谷的。那会儿陕西穷, 过不下去, 我爷爷就带上我父亲来了内蒙。刚来的时候都是租蒙人的地, 到收成的时候看是二八股还是三七股分成。这儿的汉人每年收完秋就回口里。我们王家最早也不在这儿住, 开春种地的时候来这刘家壕, 收完秋给人家把租子一交就回老家, 回去过个冬, 等开春再来, 年年都“跑青牛犊”。^②

“跑青牛犊”是早期汉族移民最真实的谋生方式。“二饼饼牛车拉铺盖, 离乡背井走杭盖。孤雁离群落荒沙, 山野草地安了家。”“买不上椽子砍上几根棍, 搭上个茅庵庵好安身。牛粪烧火沙蒿燃, 水淹沙葱焖捞饭。”这些流传在汉民中间的山歌形象地反映了早期移民艰难的生活境况。早期“跑青牛犊”的汉族移民到鄂尔多斯大都是自发的, 且绝大多数为男性, 这种流徙不定的生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这块异族的土地上聚居成村。这些游离于内地汉族民俗圈的移民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民俗群体出现在内蒙古草原, 汉族民俗圈的构建伴随着移民村的增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 中期: “蒙古农民”的出现与蒙汉民俗文化的对等交流

民俗圈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形成的, 不同民俗圈或者不同文化族群初始接触时

①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伊克昭盟志[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4: 452.

② 访谈对象: WSF, 汉族, 男, 50岁, 访谈时间: 2006年2月8日, 访谈地点: 刘家壕村 WSF 家中。



存在隔膜甚至产生偏见都是难免的,因此早期蒙古族民俗圈对汉族移民的拒斥也是符合常理的。随着汉族群体的壮大和汉族民俗圈的构建,汉族民俗的优越性日渐体现出来并开始广泛地影响土著蒙古族,蒙古族逐渐向汉族敞开大门,两个民俗圈出现了平等交流的态势。

1. 蒙古族的内迁和汉族村落的建立

光绪年间放垦以后,汉族农民逐渐向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扩展迁徙,通过强行开垦,绝大部分宜牧草场变成了农田。到民国年间,大批蒙古族牧民失去了牲畜赖以生存的草场,一部分牧民赶着牲畜向鄂尔多斯南部、西部的鄂托克旗、乌审旗迁移,大多数牧民则选择留下来,在原来的草原上开垦土地,耕作农业,变成了“蒙古农民”,开始了农耕生活。

清末放垦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早已开垦的熟地,汉民们交了所谓的“押荒银”,由垦务局发给部照,他们凭此拥有了土地永久的使用权。这样一来,大批租种蒙地的“雁行人”定居下来,由流动人口变为真正的移民。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民人数急剧增加,蒙汉人口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2 民国二十五年伊克昭盟蒙汉人口分布情况表^①

	郡王旗		准格尔旗		达拉特旗		杭锦旗		鄂托克旗		乌审旗		扎萨克旗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蒙古族	4700	43%	37,000	37%	13,000	18%	9000	31%	183,000	65%	8400	74%	2500	56%
汉族	6300	57%	64,000	63%	60,000	82%	20,000	69%	100,000	35%	3000	26%	2000	44%
合计	11,000		101,000		73,000		29,000		283,000		11,400		4500	

资料来源:《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

随着早期移民走向定居以及后期链式迁移引发的大批内地人口入住,鄂尔多斯的村落逐渐发展起来。早期“跑青牛犊”的汉民们的临时住所最早发展成村落,因住所多依圪堵、圪台、坡、梁、壕、湾等地形而建,这些地形名的前面加上最先落脚人的姓氏便成为村落的正式名称,如准格尔旗大路乡的付家圪旦、王梁壕,巴润哈岱乡的王家梁、高家圪旦,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的刘家壕、杨木匠圪堵,荫亥图乡的苏家圪台、王长圪卜等。光宣、民国时期,鄂尔多斯村落的形成速度非常之快,就以有确切形成时间的村落而言,民国时期形成的村落的数量较光绪之前成倍增加,其中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和杭锦旗的增长速度最为显著,分别为光绪前的4.6、27.8、9.7、21倍。

2. 鄂尔多斯汉族民俗圈的构建和蒙汉民俗的双向交流

随着鄂尔多斯移民、村落的增加,汉族移民逐渐由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散居生活走向以村落为单位的定居生活,汉族的文化优势也进一步显现,内地的社会秩序逐渐在草原上构建,汉族的民俗圈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鄂尔多斯建立起来。蒙古族民俗的主导地位日渐削弱,两个民俗圈的对话逐渐以平等的姿态展开,两个民俗圈在互动、整合中走向融合。

a. 优势互补的生产民俗。蒙古族虽然也曾有过农耕经历,但是,历史上蒙古族的农业仅仅是作为游牧业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的,且经营方式也非常粗放。贺扬灵在其《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中对蒙古族的这种落后、粗放的经营方式作出了描述:

蒙古人的附带生产是农业,而主要的生产还是牧业,所种植的多是一些糜黍子,这亦是蒙古固有的谷种。其方法,多是四月间入种,先以牛很简单的锄耙一下,就把种子下去。雨后这些种子自然会侵入土层里面,再过相当时期,到了秋天,就穗而结实了。他们又没有特别刈获农具,腰上只带着一把小刀子,只是胡乱的割取了事。这种耕种与收获法,是最原始的。^②

^① 此数据不包括长城以北牌界以南地区、西南部的沃野设治局及宁夏平罗县管辖之地的数据,且这里的比例仅为蒙古族或汉族所占蒙汉总人口的比例。

^②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30.

汉族农业人口的到来使蒙古族原始的耕作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汉人的影响下,土著的蒙古族人开始学习种植谷子、荞麦、莜麦等杂粮,并尝试种植豆角、胡萝卜、葫芦、茄子、辣椒等,同时逐渐掌握了一些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后来由于土地退化,产量下降,他们也开始学习汉民沤制圈肥,改变了以前将牛羊粪当燃料的做法,注意施肥、灌溉、除草。“他们既注意保持水土,更注意与洪水斗争,保护田地特别是一些沟渠塔地边。农民打拦洪坝淤澄土地,在防洪堤岸上栽种沙柳、雾柳柠条和树木,保田又保收。”^①汉族移民在长期的牧区生活中也学习蒙民的牲畜养殖方法,“学会了优选牧场、抗灾保畜、制作乳品等生产生活技术”。^②这些汉族农民“很注意保护牧场,即使是卖给自己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尽量经营自己的原耕地,很少随便开垦牧场种粮。他们懂得以牧促农以农养畜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③

b.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饮食民俗。鄂尔多斯地处塞北高原,气候干燥寒冷,而且冬季漫长,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独特的饮食风俗,牛肉、羊肉、马肉和牛奶、羊奶、马奶等畜产品构成了蒙古族传统饮食结构的主体内容。所以,他们的食物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乌兰依德根(肉食)、查干依德根(奶食)。肉食主要包括手扒肉、烤牛、烤羊、烤羊腿、肉干、肉粉等。煮熟的肉要一次吃光,春夏季吃不了的生肉会被割成细条,撒上盐,放在通风处晾干,也有人再把干肉磨成肉粉,这样处理过的肉食不但不占地方,而且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和保存。奶食包括马奶子、酸奶、奶酪汁、奶茶、奶酒、奶豆腐、奶干、奶皮子等。蒙古族传统烹调方式以煮、烤、烧为主。与蒙古族相比,汉族的以米、面、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以及精烹细制的烹调方式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于是两族饮食出现了相互采借的情况,这推动了鄂尔多斯饮食文化独特性的形成。

(三)后期:村落的广泛建立与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大范围涵化

文化只有在交流的开放空间中才能迅速发展。在汉族人口大幅增加、蒙汉杂居格局日渐形成、农耕民俗圈逐渐重建并日益彰显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土著的蒙古族民俗圈和汉族移民民俗圈之间的互动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展开,蒙古族文化的演化在异族文化圈的参与下改变了正常的轨迹,蒙古族文化以一种全新的文化秩序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建立起来。

1. 村落的广泛建立与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

经历了康熙以来两个多世纪的人口流动,鄂尔多斯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9年,鄂尔多斯的汉族人口增长到357 668人,占鄂尔多斯总人口的86.87%,满、回等其他民族仅有143人,蒙古族为53 936人,仅占总人口的13.10%。^④蒙古族这个鄂尔多斯曾经的主人终于变成了这里的少数民族,农耕生产在内蒙古草原上普及起来,汉族和蒙古族的村落广泛建立,蒙汉杂居格局形成。

蒙汉杂居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蒙古族村落与汉族村落交错;二是蒙古族人与汉族人交错。后一种为主要形式。蒙古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的交错除了在牧业还算兴盛的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还能看到外,在其他旗已经极少见了。“游牧的蒙古人,每不喜在骑马不到一天便可到汉人的村落的地方居住,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恐怕被人统治,被人征税,但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的牲口如践踏耕田,则彼此之间势将时起齟齬的缘故。”^⑤交错的蒙汉村落更多出现在牧区和农区的交界地带,在如今的鄂尔多斯已是极少数,合村居住才是鄂尔多斯蒙汉民族最普遍的杂居形式,也是蒙汉结合关系中最亲密的一种形式。大范围的杂居大大密切了

① 政协东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东胜文史资料(第1辑)[C].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日报社, 1984.110.

②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伊克昭盟志[M].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4.411.

③ 政协东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东胜文史资料(第1辑)[C].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日报社, 1984.113.

④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伊克昭盟志[M].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4.452.

⑤ 兰特模著,任美铨译. 汉人移殖东北之研究[J]. 新亚细亚, 1932. A(5).



两族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两族民俗的融合进程。

2. 汉族民俗的广泛传播与蒙古族民俗圈的大幅涵化

“涵化”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美国人类学家称之为 acculturation ,它指“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接而发生的文化变迁”。^①在农耕文化圈与游牧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的相互接触中 ,它们各自作为完整文化系统和独立单位的状态被打破 ,在双向交流中双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涵化。到后期 ,蒙古族民俗圈涵化的程度远大于汉族民俗圈。汉族民俗向蒙古族的广泛流动具体表现在语言、住宅等方面。

语言。鄂尔多斯汉族人口增多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蒙古族 ,学习语言的趋势由汉族学蒙古语逐渐转变为蒙古族学汉语。在汉族移入早的蒙旗 ,汉语流传速度最快。到民国中期 ,汉族移居最早的准格尔旗 ,“蒙人几乎皆通汉语 ,年少者作蒙 ,反不若汉语之纯熟矣。”^②《准格尔旗志》记载 :“由于汉民大量入境定居 ,蒙汉日夕相处 ,往来频繁 ,在生产、经济和生活逐渐相通的过程中 ,蒙古人民普遍学习汉语言。上下公文同用汉文 ,新学教授 ,亦以汉文为主 ,甚至文艺生活 ,如晋剧和二人台的汉族艺术 ,也极为普遍。蒙古语言文字的应用面日见缩小。”^③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对汉语的吸收也表现出分区结合特点 ,接触的汉族群体不同 ,习得的汉语方言也不同。“鄂尔多斯黄河南面达旗人说话和山西人差不多 ,伊旗和神木人说话差不多 ,乌审旗说话跟榆林差不多 ,东胜东边的和府谷说话一样 ,这些地方的汉人原来都是从那些地方过来的 ,蒙人说的汉话也就跟着带了各种口音了。”^④

住宅。蒙古族逐水草而居 ,住屋原都是移动性的蒙古包 ,只有大大小小的喇嘛庙是固定的土木或砖石建筑。随着蒙人由游牧走向农耕并逐渐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生活 ,牧民也模仿汉人 ,修造固定房屋。达拉特旗的蒙人自新中国成立后 ,绝大多数走向定居 ,他们“由活动的蒙古包改为土木结构的单平房 ,均为一门一窗 ,一户一室。基本与汉族相同……80 年代 ,蒙汉居住同步发展 ,较富有的家庭建砖木结构的起脊瓦房或平房 ,样式多种 ,窗子面积扩大 ,多为一层或双层玻璃 ,室内陈设开始向现代化发展。”^⑤

蒙古族民俗圈涵化的程度远大于汉族民俗圈。这一方面由于汉族农耕民俗圈有着更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是一个更有效的自我完善的文化系统 ;另一方面由于蒙古族的民俗圈本身具有开放性、包容性 ,更善于吸收来自异族文化的积极因素 ,尤其是蒙古族在自身的文化积累还不够深厚的时候 ,更易于接受强势的农业文化。

三、交汇区村落民俗文化融合中的差异性

(一)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层次性与蒙汉杂居的区域差异

1.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层次性

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层次性 ,境内土地按自然地貌及成因条件可以分为四大类型 :北部黄河冲积平原区、东部丘陵沟壑区、中部库布其、毛乌素沙区、西部坡状高原区。总体来看 ,鄂尔多斯东部、北部地区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杭锦旗因大部分地处黄河冲击平原区 ,有降水和灌溉的双重保证 ,再加上这些地方良好的土质条件 ,更适合农业的发展 ,因此农业的扩展速度也就明显地快于西部。鄂尔多斯的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逐级递减 ,西部的土壤和植被更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 ,位于鄂尔多斯西部的鄂托克旗“全境几乎全为草原……杭锦旗的西南部 ,郡王旗的西北部等地都是极好的草地。伊盟地区有很多灌木 ,乌审旗

①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9.

② 傅增湘.绥远通志稿[M].卷73.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抄本,1939.

③ 准格尔旗志编纂委员会.准格尔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547.

④ 访谈对象:LSY(原东胜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访谈人:段友文,男,山西大学教授;高瑞芬,女,东胜税务局干部。访谈时间:2006年2月13日。访谈地点:LSY家。

⑤ 达拉特旗史志征编办公室编.达拉特旗志[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为最多。”^①鄂托克东部地区原本为优良的牧场,水草肥美,长满了枳机,有一首顺口溜讲道:“巴彦淖的群马,达拉吐鲁的牛,枳机林里不露头。”政府的放垦曾经使这里的农业一度短暂发展,但是由于风蚀沙化,终至弃垦,因此农业在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以及乌审旗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这里在民国时期基本上仍处于游牧状态,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农业发展落后于东部、北部各旗。

2. 蒙汉杂居的区域差异的形成

清廷在鄂尔多斯推行放垦政策,通过强行开垦,绝大部分宜耕牧场变成了农田,仅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就达 13 410.5 顷,占鄂尔多斯放垦总面积的 4/5。西南部的鄂托克旗虽然报垦 10 000 顷土地,但地多沙碛,不堪耕种,真正放垦的只有 175.3 顷,乌审旗放垦数量也极少。因此,鄂尔多斯放垦的地区多集中在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和杭锦旗。

汉民的进入是与各旗土地的放垦相伴随的,放垦时间早、放垦数量多的地区流入的汉民也相对较多,村落发展速度较快,蒙汉杂居格局也形成得更早,更彻底。乾隆年间,河套东部一带的黄河河道变迁,达拉特旗与土默特旗发生争端,其时达拉特旗的沿黄河南岸一带已经有移民迁入。光绪宣统两朝时,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和达拉特旗三旗建立的自然村为多。到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北部各旗“地多已开垦,则汉人稠密,蒙人杂居其间者,为数寥寥。”^②至 1936 年,“准格尔旗有垦地不下二十万顷”,达拉特旗“几乎完全为农业区域,牛羊所至,阡陌在望,不复游牧景象矣。”^③达拉特旗的自然村中也有一部分最早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民国十七年后,本旗蒙民感于牧场日蹙,牧畜日减,为应生活之要求,曾先后向旗政府领地,自行耕种。自是以后,相率成风,旗府附近,直到黄河南岸,蒙人耕作者,阡陌相望。”^④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在民国时期建立的自然村数量仍比较少。“伊盟右翼四旗(指现在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和杭锦旗)的人口,蒙汉约各占半数,惟因蒙汉人民技能有别,汉精于农,蒙精于牧,如杭旗四边开垦,中部放牧,于是汉人住于四边,蒙人则居于中部。”^⑤

(二)交汇区民俗文化融合在内容上的不平衡特征

民俗文化本身的层次性决定了民俗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不会是一个没有差别的匀速过程,交汇区民俗文化的融合进程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多样性。鄂尔多斯蒙汉民俗文化的融合存在着差异性,不同类别的民俗,融合的速度不同。

1. 物质民俗:民俗文化融合的起点

在鄂尔多斯,蒙古族和汉族的民俗文化融合以物质民俗融合进程最快,融合内容也最为广泛。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民俗本身的现实性特点——它与现实的生产生活需要紧密相连,与地理、气候、社会生活的变迁紧紧相随,其变化更迅速,更直接;另一方面由于它涉及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最小,在民族间的流动和被接纳更便捷,融合也就更普遍。

汉族饮食以粮食、蔬菜为主,他们刚到鄂尔多斯时对于蒙古族饮食方式的疑惑和排斥普遍存在,然而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汉族的饮食习惯在蒙古族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鄂尔多斯地处北部边疆,四季变化明显,夏季酷热,冬天寒冷漫长。奶产品尤其是酸奶可以消暑降温,充足的肉食和热气腾腾的奶茶可以帮助人们驱走严寒,于是,汉族逐渐借鉴了蒙古族的饮食方式,在自己的饮食系统中增加了奶食和肉食的比重。在蒙古族的饮食习惯日渐渗入汉族的同时,汉族的饮食风俗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蒙古族,蒙古族在奶食和肉食结构中增大了蔬菜和粮食的比重。如鄂尔多斯的居民,一到秋季,各家各户都要腌上几百斤蔬菜,以供深秋和冬季的菜食需要,蒙古族的日常饮食搭配也更趋科学化、合理化,他们在烹调上更多地吸收了汉族的

①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伊克昭盟志[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208.

② 伊克昭盟政协.伊克昭盟文史资料[C](第2辑).内部资料,1988.32.

③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4.

④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M].1941年铅印本.27~28.

⑤ 伊克昭盟政协.伊克昭盟文史资料[C](第3辑).内部资料,1998.148.

长处,开始重视佐料和配料的使用,他们吃肉已经不再像解放前那样将肉大块地放入水中粗放地煮食,而是像汉族一样做得精细。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蒙古族和汉族的饮食风俗正在相互优选,各取所长,形成别具一格的饮食风尚。

2. 社会民俗:民俗文化融合的深入

与物质民俗相比,社会民俗的交融就复杂一些,这当中始终伴随着选择性的吸纳。就仪式文化或观念文化的改变来看,一般来说,首先是选取最喜欢的、吉祥的、便利的或与自己习惯最为接近的内容糅合,日久天长,更多的内容才融合进来。

如人生仪礼方面,蒙古族接受汉族给幼儿挂锁开锁的习俗,认为它是吉利的,可以保佑孩童健康成长,所以,如今的鄂尔多斯,无论蒙汉,都要在孩子年幼时挂锁,到孩子12岁时举办开锁仪式。婚嫁方面,汉族在婚礼上喜用蕴含早生、多生、圆满等寓意的红枣、核桃、花生等果品,这种习俗为蒙古族的婚庆仪式所吸纳,以取其吉祥、幸福之意。另外,合“八字”本是汉族的风俗,因其契合了蒙古族笃信上天、乞求幸福婚姻的心理,因此也很早就在蒙古族当中流行。鄂尔多斯各旗蒙古族在男女嫁娶之时,“先由男家遣媒向女家探取意见,如经承允,即可彼此过访,并请喇嘛排合八字,如认为匹配无妨,则行聘礼。”^①丧葬方面,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哪里死了哪里埋了,烧上一堆柴禾,撒些吃吃喝喝,让飞鸟走兽知道这个地方死了人了,不等你走了,这些飞鸟就把那摊飒(方言:吃)了。不存在一家老婆汉子、爷爷奶奶、子子孙孙埋在一起。这居住在一块了,就蒙人学汉人,汉人学蒙人。……现在人们都开始时兴土葬、火葬了。”^②

可以看出,在社会民俗的接纳方面,那些契合双方民俗心理的内容较早进入融合的范围。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现代观念的渗透,蒙古族和汉族民俗都在经历着变革,日渐向科学的方向发展。

3. 信仰民俗:排他性的固守

信仰作为观念文化的核心,是民俗融合过程中最具传承性和保守性的内容。由于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蒙汉杂居时间较长的地区,在汉族的影响下,蒙古族原有的祭祀仪式多有简化,且很多祭祀已由专门的族内活动转而进入蒙古族日常的家庭生活,但是祭敖包、玛尼宏等信仰民俗一直在族群内传承,至今未有中断。

祭敖包。祭敖包是鄂尔多斯蒙古族普遍的祭祀习俗之一。敖包亦称“脑包”、“鄂博”,意即“堆子”,多以沙土、石块堆积而成。祭敖包是蒙古人中极为隆重的祭祀活动之一,多于草肥畜壮、气候宜人的夏秋之际举行,届时人们携酒、肉及各种奶食品汇集敖包处献祭、祈祷。萨满教时代,杀牲献祭是祭敖包的主要方式,是谓“红祭”。藏传佛教(喇嘛教)传入鄂尔多斯后,杀牲献祭遂变更为果品祭,是谓“白祭”,但“红祭”并没有完全消失,萨满跳神也改为由喇嘛带领众人绕敖包行走,诵咏经文。

祭玛尼宏。玛尼宏祭祀是鄂尔多斯蒙古族非常独特的一项信仰活动。大凡鄂尔多斯蒙古人家,都在蒙古包或房屋前面竖立着一根或两根旗杆,旗杆顶端迎风飘扬着印有骏马图的布幡,这是象征成吉思汗军徽神祇的玛尼宏杆。玛尼宏杆一般立于主房正前方约十丈远的地方。鄂尔多斯蒙古族竖立玛尼宏杆是对命运吉祥的寄托,祭祀玛尼宏杆成了鄂尔多斯蒙古人生活习俗中备受重视的一件大事。清晨,人们为玛尼宏杆举行薰香仪式,一般由男主人先在神台上焚烧松柏、檀香等气味芬芳之物。等浓烟过后,在红火中泼撒作为圣物的可口食品。然后,全家人合掌胸前,默读祭文,跪地叩拜、祷告,希望一切顺利。

可见,在鄂尔多斯,蒙汉两族在信仰上的相互影响是较为微弱的。一方面,迁移到此的汉族本身缺少原籍深厚的家族关系和地区信仰,传统民间信仰活动处于边缘化,无法形成主导的精神信仰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信仰的惰性延续,蒙古族的各种信仰方式在俗信化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核心的内容,在族群内传承。

① 伊克昭盟政协. 伊克昭盟文史资料内部资料[C](第2辑). 内部资料,1988.212.

② 访谈对象:兰七(蒙名:达愣绝日格),男,蒙古族,51岁,展旦召大队支部书记,高中文化。访谈人:段友文,男,山西大学教授;高瑞芬,女,东胜税务局干部。访谈时间:2006年8月7日。访谈地点:展旦召嘎查。

四、小结

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所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村落内的民俗文化融合是复杂的,在时间上表现为阶段性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内容上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总之,我国境内的56个民族是相互依存、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每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在中国各民族的碰撞、对接与融合过程中,汉人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构成多元一体的格局。鄂尔多斯这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的民俗文化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发展终将推动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

[收稿日期]2011-03-08

[作者简介]段友文(1957~),男,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学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所教授,

太原 030006

高瑞芬(1980~),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税务局干部,民俗学硕士。

东胜 017000

Investigation on Ethnic Folk Cultur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Villages in Mongolian-Han Intersectional Areas : Taking Ordos Villages as Examples

Duan Youwen Gao Ruifen

Abstract: Nomadic and farming intersectional areas contain two cultural traits. Taking the villages in ZhunGeErQi, DaLaTeQi and Etuok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Mongolian people and Ha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Ordos—the Mongolian-Han intersectional regions. Longitudinally,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culture is obviously staged for the direction that two groups' customs flows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mutual permeability are totally different in various periods. Transversely, the integration of two customs is spatially unbalanced as the spread of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mixed living of two ethnic groups determined the degree of their integration. The fusion of two folk cultures enhances the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of old single culture and folklore becomes a window to explore social changes. So, studying the way that ethnic groups with different traditions get on well with one another in long-term engagements,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in field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culture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villages in intersectional areas.

Key words: nomadic and farming; intersectional area; integration of folklore; assimilation